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贺雪峰

陈文琼 著

半城市化

农民进城策略研究

SEMI-URBANIZATION
RESEARCH ON PEASANTS'
URBANIZATION STRATEG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贺雪峰

半城市化

农民进城策略研究

SEMI-URBANIZATION

RESEARCH ON PEASANTS'
URBANIZATION STRATEGY

陈文琼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城市化：农民进城策略研究 / 陈文琼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3332-6

I. ①半… II. ①陈… III. ①农民-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3459 号

·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

半城市化：农民进城策略研究

著 者 / 陈文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4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332-6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总序

一

2002年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我们提出了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三大共识是华中村治学者多年研究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一直以来也指导着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实践。

“田野的灵感”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优先原则。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时期，经验现象十分丰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在理解经验与实践过程中形成对经验与实践的解释，是华中村治研究的显著特征。

“野性的思维”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只要有利于增加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正是在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提炼与概括，会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野性的思维”另外一层含义是，不拘一格，大胆假设，不怕出错，敢于探索。

“直白的文风”强调华中村治研究要能容纳多学科、经验性与原创研究的特点。经验研究看起来没有进入门槛，真正深入进去却需要长期积累和学术功力。“直白的文风”反对雕琢文字、闭门造车，注重想事说事，注重研究向大众开放，注重多学科研究对话。开门搞研究而不是关门自我循环，是华中村治学者的一个基本准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 5000 年文明，14 亿人口，陆地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 已是世界第一。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时期，农村人口迅速城市化。中国正由一个传统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国家。如何理解巨变中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在这个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并转而指导实践和改造实践，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

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定是伟大的，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是饱含中国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实践的视野，而不是屏蔽我们的视野。脱离中国实践的语境，套用没有经过中国实践注解和浸泡的西方理论，往往不仅不能改善我们的视野，反而可能屏蔽我们的视野。只有真正进入经验与实践，我们的理论才有还原经验与实践的能力，才能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视野，真正理解实践和改造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理解和解释伟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产生的，是服务于中国实践并以中国实践来检验的。这样一种从经验中来一形成理论提炼与概括一回到经验中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循环，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大循环。只有在这样的大循环中，中国社会科学才能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也才能获得丰富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滋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具有生命力。有了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就必然会有从理论出发一到经验中去一再回到理论的以学术对话为特点的小循环，这样一种小循环是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国社会科学大循环的。

要在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与实践的大循环中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要有充分的经验训练，要在长期经验调查中形成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要有“经验质感”，不仅要能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命题，而且要有将理论还原到经验中的能力。

获得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是进行饱和和经验训练，不断地到经验中浸泡，

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具有将经验碎片整合起来的能力，真正形成想事的能力。饱和经验训练尤其要防止对经验的一触即跳，即仅在经验中产生了微弱问题意识就脱离经验去做精致“研究”。正是通过饱和经验训练，才能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验，才能将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概括，才能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十数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建立在饱和经验训练基础上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事业。这个事业从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开始，又回归经验与实践，中间留下的理论提炼与概括正是建设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砖瓦。

二

最近十数年来，我所组织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每年驻村调研时间都超过了4000个工作日，平均下来，我们研究团队每天都有10人以上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某种意义上，我们团队同仁都是经历了饱和经验训练的。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前的20世纪末期开始农村调研，到现在国家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现在中国城市化率已近60%，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从地域上，我们不仅在南方中国、北方中国和长江流域调查，而且近年密集地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了南北中国、东西中国和中国腹地的巨大区域差异；从研究主题上，我们从基层政治研究开始，进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再延展到对几乎所有乡村主题的研究上，比如家庭制度、农业发展、宗教信仰、土地制度、乡村教育、医疗保障，等等；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跟着农民工进城，开始城市社区、街头治理、信访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希望在调查和研究中，能做到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真正从经验中得灵感，依靠经验形成“想事”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若干理论提炼与概括。



十数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饱和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理论概括，这些理论又作为视角参与到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农业、土地、信访、乡村治理、城市化等方面政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队坚持下去，再坚持十年、十数年，我们就一定可以形成理解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学科一家之言。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有百十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我们呼吁各种一家之言良性竞争，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最终成长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来。

我们计划在未来七八年时间将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纳入“华中村治研究丛书”出版。希望丛书能增加读者对华中村治研究的了解。

是为序。

贺雪峰

2018年4月10日晚

第一章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_003
- 二 城市化研究的三大范式 _006
- 三 发展型半城市化：一个四维分析框架 _018
- 四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_032
- 五 本书结构安排 _036

第二章 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目标的自我实现

- 一 农村挤压与农民城市化动力：社会结构的视角 _041
- 二 农村生活遭遇与对各类社会资源的渴望 _044
- 三 城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对农民城市化目标的考察 _056
- 四 城市化实践中的农民家庭发展秩序 _067
- 五 本章小结 _071

第三章 就近城市化：半城市化的空间解释

- 一 半城市化：是畸形产物还是客观需要 _075
- 二 作为农民家庭客观选择的半城市化实践 _078
- 三 半城市化格局下的就近城市化实践 _083
- 四 理解半城市化及其格局下必然发生的就近城市化实践 _088
- 五 本章小结 _099



第四章 家庭成员的流动与生成：半城市化的社会流动分析

- 一 农民家庭的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结构图式的再建构及其描述 _ 103
- 二 半城市化格局下从农村有产者到“三重中间位置”的阶层实践 _ 113
- 三 农民半城市化实践的阶层规避：避免沦为贫弱无产者 _ 122
- 四 本章小结 _ 131

第五章 半城市化的发展性意涵与发展型半城市化

- 一 家庭裂变：半城市化格局下农民家庭发展的现实路径 _ 135
- 二 农民城市化与农业去过密化 _ 145
- 三 城市化的可逆性与去城市两极分化 _ 155
- 四 结构优化与社会稳定 _ 160
- 五 发展型半城市化 _ 163

第六章 发展型半城市化的制度结构：保护型二元结构

- 一 从家庭合力到“恩往下流” _ 169
- 二 从“关系地权”到“道义秩序” _ 177
- 三 “耕者有其田” _ 183
- 四 可逆性与迁徙自由 _ 191
- 五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_ 194
- 六 保护型二元制度结构：发展型半城市化赖以生成的制度基础 _ 195

第七章 推进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转变的政策分析

- 一 农民家庭由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转变过程中的梗阻问题分析 _ 201
- 二 推进彻底城市化的涉农政策目标与效果之间的错位及其生成机理 _ 213
- 三 推进彻底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_ 225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 跻身“三重中间位置”：农民家庭半城市化实践的阶层分析 _ 241
- 二 发展型半城市化的内涵、制度结构和梗阻问题 _ 245
- 三 对从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转变进行政策分析的研究展望 _ 247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一方面,城市化率平均以每年超过 1% 的速度在增长。2016 年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由 1978 年的 17.9% 增长到 56.1%,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从不足 2 亿增加到超过 7 亿。^① 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存在滞后:首先,截至 2014 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 36%,与同年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3.7% 相比,严重滞后;^② 其次,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的滞后状态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激烈讨论。

主流观点认为,当前的城市化滞后状态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持续剥削的结果,是一种不良的城市化状态。只有打破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才能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真正推动人口城市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彻底城市化,城市人口集聚将推进城市产业升级,因此,他们事实上倾向于积极的人口城市化战略(周其仁,2013、2014;文贯中,2014)。他们主张,不仅要全面放开欠发达地区城市户籍的准入,还要全面放开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的城市户籍准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统一的城乡居民登记制度(黄锴,2009;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此外,他们还主张开放农村土地要素市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6 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16-4-15,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5/t20160526_1361050.html。

② 参见中国政府网新型城镇化专题, <http://www.gov.cn/zhuanti/xxczh/>。



场，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解除农村户籍与农村土地的挂钩、捆绑，明确农村各项资源的产权归属，破除农民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制度束缚，增加农民城市化的资本，让农业转移人口从土地资源和制度身份上彻底与农村脱钩，真正实现城市化（蒋省三等，2007；文贯中，200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等，201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改革举措也基本采纳了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主张。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走以推动人口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村土地产权“三权分置”的办法，目的在于放活农地经营权，并允许经营权抵押融资，打破工商资本下乡、农业资本化的制度障碍，同时推动农村股份制改革，解除造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不彻底的农地束缚。为破除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困境，成都、重庆借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政策之机，选择试点，开展指标交易，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迈开步伐提供了新思路；从2014年开始，武汉等30多个全国首批农村综合产权改革试验点纷纷向成都、重庆学习。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人地钱相挂钩”的办法，实现“人往城转、地随人走、钱从地出”，解决“人难进城、地难转出、钱难获得”的城市化梗阻问题。

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不必急于改变当前的城市化滞后状态，与上述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这种状态是城乡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提供的制度红利和制度保障。潘维（2009）认为，不能激进地推动土地流转与宅基地和耕地的转让使进城农民彻底隔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耕地和宅基地并不是农民致富和获得城市化资本的保障，而是八亿农村人吃住安全 and 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城市没有拒绝乡村人……然而城市没有能够保障2亿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工作和住房福利。不是不想，而是不可能……出售耕地和宅基地所得的资本难以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吃住和住房安全”。贺雪峰（2010、2014a）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关

键在于为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因为只有找到工作，农民进城后才能生存……城市显然不大可能出现大量的稳定且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当然，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钱来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让他们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福利条件……因此，进城务工的农民及其家庭也不可能离开农村和农业……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很可能导致农民工及其家庭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应该坚持稳健的城市化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观察，认为以城市贫民窟为表征的城市两极分化的产生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且产生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滞后的城市化状态也并未摆脱陷入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容忍”贫民窟的存在，他们或者主张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由选择与福利供给而彻底扭转改变贫民窟的经验（秦晖，2008）；或者从各国的贫民窟中看到了贫民群体的流变性，即一部分人把握住了市场机会成功跻身城市中产阶层，融入城市社会，并使城市中产阶层数量得到增长，而中产阶层的数量正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此，他们进一步指出，当前滞后的城市化格局不仅没有阻止贫民窟的产生，反而由于“汇钱回乡村”导致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买房，并且乡村失业保险功能的发挥是以家庭的离散为代价的（桑德斯，2014）。

上述三种分析充分表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长期的农村调查和对中国农民城市化问题的持续关注中，笔者认识到，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根源于我国所面临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背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地关系劣势与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等基本国情；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紧密相关。因此，上述争论可以统一于一个基本的学术命题：在市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① 正如贝利在其经典著作《比较城市化》中所言：“20 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对世界不同部分的比较，使我深信，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可以肯定不会只有一种，而是有多重路径，各自的成因及相应的后果不同。”因此，必须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来应对不同政治社会背景下的城市化过程研究。



笔者将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考察近 30 年来中国农民城市化实践的一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民城市化发展的独特路径，进而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二 城市化研究的三大范式

关于城市化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 Eldridge (1956) 为代表的“人口城市化”、以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 (1989) 为代表的“空间城市化”以及以 Wirth (1938) 为代表的“乡村城市化”。其中人口城市化有两层含义，即人口集中居住与人口就业形式的非农化，如此便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分野；空间城市化将城市化分为形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性的城市化，强调从多维度对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乡村城市化将乡村与城市对立成落后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城市化是从落后的乡村社会向文明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

由此观之，城市化可以分为两个社会过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即城市化率增长的过程；以及城市社会自身的空间优化重组过程，或称城市的现代化过程（文贯中，2014：23）。学界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这两个过程进行剖析和解释，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大研究范式：二元经济结构 - 人口集聚范式和城市两极分化 - 城市融合范式。此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化和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超前而城市化率滞后”这一现象的研究形成了第三种研究范式，即滞后的城市化 - 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范式。

（一）二元经济结构 - 人口集聚范式

二元经济结构 - 人口集聚范式主要遵循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人口迁徙理论的传统，形成了极具解释力的“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理论，包括人口的推拉因理论、托达罗模型；还形成了对城市发展不均衡进行解释的理论，包括城市发展阶段理论、“中心 - 边缘”理论、集聚经济理论、以乡村“聚

落转型”为基础的“扩展大都市区”等，它们是对单线条的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理论的有力补充；再就是，对前述两类解释路径进行衔接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

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模式下，人口从乡村迁往城市聚集，是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净人口迁移流往往是农村迁往城市”，“就一个城镇来说，往往是周边地区农村的人口迁往城市，然后偏远农村地区的人口再迁往城镇周边农村”（Ravenstein, 1885）。在此基础之上，Todaro（1969）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关注，进一步明确了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的经济学意涵，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人口迁移的托达罗模型”。该模型假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差异越大，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机越强，迁移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和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这二者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其政策意义在于，如何使用城市最低工资制度和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对可能进城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行调控。

在托达罗模型中，人口城乡迁移理论的第二个立论基础是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这一模型将城市和乡村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部门的劳动边际报酬不同，且往往城市高于农村。一定程度上高的边际报酬形成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拉力，但因为劳动力供给无穷大，而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这意味着虽然劳动力供过于求将会导致城市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报酬迅速下降，但仍然不会阻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因为劳动力供给无限大还意味着农村劳动边际报酬无穷小甚至为零。在这一模型下，城市经济所产生的红利将集中到资本家和管理层等少数人手中进行扩大再生产、实现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刘易斯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红利。倘若这一假设前提不存在，即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出现，将达成二部门经济劳动边际报酬均衡，此即著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 1958）。刘易斯拐点对人口城市化的重大启示在于，城市扩张在劳动力短缺的结构性束缚下存在边界。

城市化还意味着占一个社会大多数的城市非农人口将由少数农业人口